

回望斯诺

——《埃德加·斯诺：红星为什么照耀中国》创作谈

■丁晓平

是最早版本等问题出现一些争论。于是,在许多专家的帮助下,我花了7年时间,对新版《毛泽东自传》引起的诸多话题进行研究。2008年,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解谜〈毛泽东自传〉》。2015年,为纪念埃德加·斯诺诞辰110周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了《记者之王:埃德加·斯诺在中国》,改名为《埃德加·斯诺》,增补了大量由埃德加·斯诺的亲属和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专家们提供的照片。

在20世纪的中美关系史上,作为一名记者,斯诺因在中美之间发挥了特殊影响与作用而闻名于世,并被历史记住。直到今天,《红星照耀中国》这部著作仍是人们了解现代中国的必读书之一。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曾说过:“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1972年,毛泽东在听到斯诺逝世的消息后,立即发出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1928年,斯诺来到上海,目睹了遭受列强殖民主义瓜分、日本帝国主义蹂躏和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统治的旧中国,亲身体验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从而理解并同情、支持了中国革命。他以客观、公正、诚实的品格,参与帮助了中国青年学生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他是第一个报道上海抗战的美国记者,第一个冒险进入红色苏区报道中国革命的记者,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采访并撰写《毛泽东自传》的人,第一个将长征的传奇故事传遍世界的人,第一个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公布于世的人,也是第一个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大典的外国记者……在旧中国,他曾因此两次被国民党吊销外国记者特许证,并在1941年

被迫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受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迁居瑞士。

从一个本想在中国只待6个星期“撞大运”的青年,到后来竟然在中国生活了13年之久的优秀记者,斯诺深深爱上了中国,先后与宋庆龄、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和斯诺的友谊可以说是一段历史奇缘。在斯诺病重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专门派出中国医疗小组去瑞士为他治病;他去世时,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北京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在美国,斯诺因为报道了中国革命,受到罗斯福总统的重视。在看完斯诺的著作后,罗斯福先后3次约见斯诺谈中国问题。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所说,《红星照耀中国》“的确使毛泽东在1937年成了举世皆知的人物……而斯诺则开始与他的毛泽东传记一起闻名;他成为一个面对通向中国和美国的两条道路,介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人”。斯诺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同西方世界联系的渠道,也为西方世界打开了认识中国的新窗口。众多仁人志士和国际主义者,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下来到中国,涌向延安和华北、华中的抗日根据地。他们中除了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外,更多的是记者、编辑、作家,如史沫特莱等。

斯诺在创作《红星照耀中国》后,三次访问中国。作为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消息的人,他再次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中美关系解冻的“报春燕子”。虽然在尼克松访华之前,斯诺离开了这个世界,“未能活到亲眼看见自己的努力结出果实,这是一个悲剧。但是中国人民将永远以感激的心情记得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宋庆龄语)。尼克松也曾向病中的斯诺致意,称赞他“为跨越太平洋的中

美关系的大桥架设了最初的桥头堡”。

斯诺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独特的历史人物,除了“时势造英雄”外,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忠于自己的崇高理想和追求,不人云亦云,坚持独立品格和说真话的精神。他的这种独立性成全了他在任何情况下——最高领导人接见的荣耀、国人不理解的屈辱、吊销记者特许证的打击,以及政治迫害、生活艰难、生命危险等——都宠辱不惊,一如既往。这种独立品格和坚持说真话的精神,正是人类宝贵的品格和精神。弘扬这种优秀的品格,也正是我写作本书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或许我创作本书的现实意义也就在这里。

斯诺病重之际曾说:“我热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仍像我活着的时候一样能留在中国……”当我手捧这本书面对读者诸君的时候,犹如手捧一星火种,并想认真地跟大家说——看啊,斯诺这个美国人,他的作品不是自己没有温度却去测量别人的温度计,而是火种,给人以温暖以光明;而他人生的传奇已不仅是东方与西方两个伟大国家人民友谊的见证,我相信也是对人类和平的一种呼唤。

20多年来,我对斯诺的生平研究从未止步。与此同时,我还围绕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自传》等开展了党史人物、长征史和出版史的跨学科研究。《埃德加·斯诺》今年本次再版,书名改为《埃德加·斯诺:红星为什么照耀中国》(作家出版社),以问题为导向,以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历史对比为脉络,以斯诺人生与中美关系的起伏为经纬,全书分为发现中国、南行漫记、恋爱上海、北平风云、冒险西行、中国红星、解密红都、运动工合、风雨兼程、燕子报春,共10章,力求客观、辩证地呈现斯诺的人生传奇,并从一个侧面通过他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来认识一个时期的历史,从而懂得我们国家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



装机——银河-I巨型机(中国画)

赵建华作

笔墨绘“银河” 丹青写初心

■赵建华



艺境

在多年艺术生涯中,我始终坚持“以画记史、以笔铸魂”的创作理念。我认为,军事题材美术从来不是闲情笔墨,而是传承红色基因的具象载体。中国画《装机——银河-I巨型机》的酝酿和创作历时数年。整个创作过程,对我而言既是一次对水墨技法的探索磨砺,也是一场与科研前辈的精神交流。我想以这样一幅作品致敬那些投身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研发的拓荒者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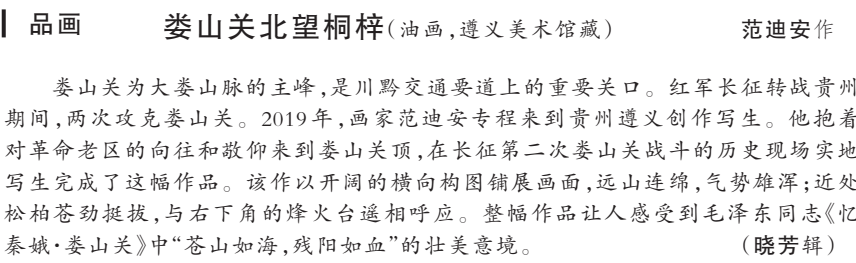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尖端科技发展遇到了瓶颈,有些重要理论研究和模拟实验,需要解决大量计算问题才有可能取得新突破,研制巨型计算机对加强国防实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时,国外对高性能巨型计算机技术实行严密封锁,因此中国迫切需要独立自主研制运算速度极高的计算机。1983年,国防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迎难而上,从零起步攻坚克难,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I”,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翻阅大量历史档案,我了解到,彼时科研条件十分艰苦,没有自动化布线设备、缺少精密配套工装,科研工作者身穿军装,白大褂,在机房里靠着手工操作,逐一排布2.5万条绕接线,12万个绕接点;全机600多块插件板,200多万个焊点无一虚焊,最终铸就了这台“争气机”。“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就诞生在日复一日的奋力攻关中。一段段鲜活的科研往事,触动着我的心。我决心用水墨人物画定格科研人员装机攻坚的经典瞬间,让“银河精神”借助国画艺术走出历史档案、走进大众视野。

在创作构思上,我没有采用全景式纪实构图的常规思路,而是聚焦机房内装机现场的近距离群像场景,以小见大,用一间机房、一组科研人员群像,折射一代人为国铸重器的家国情怀。画面构图以高大厚重的巨型机柜作为视觉骨架,林立的柜体占据画面上半部分,坚硬规整的机械柜体线条与人物灵动写意的笔墨形成刚与柔的反差,既直观凸显银河巨型机体量庞大、结构精密的硬件特征,又以冰冷机械反衬科研工作者滚烫的报国热忱。人物排布采用围聚式群像布局,几位科研工作者的形象错落分布、动静结合:站立者俯身操作台调试仪器,中间戴眼镜的科研人员研讨技术症结,还有人背对观者伏案记录数据……高低错落的人物站位,还原科研攻关时集思广益、协同攻坚的工作状态。画面细节保留时代标识,全体科研人员制服式军装外穿白大褂,一抹红色在黑白水墨间成为点睛之色,红领章成为科研工作者坚守使命、对党忠诚的精神象征。

在艺术特色的探索上,这幅作品融合传统写意笔墨韵味,力求做到写实立形、写意传神。造型层面,依托写实笔法塑造人物神态,把科研人员严谨细致、潜心钻研的精神状态具象化;笔墨层面,活用中国画墨分五色的传统技法,以浓墨皴擦表现巨型机柜厚重的金属肌理、缠绕交错的线缆,枯笔、焦墨刻画工装面料褶皱与仪器的岁月质感,淡墨晕染环境光影。我刻意弱化工业题材容易出现冰冷机械感,借助温润灵动的人物水墨,为冰冷的机器赋予人文温度。同时舍去艳丽色彩,整体以水墨黑白灰为主色调,仅用红色点染领章,以极简配色贴合艰苦朴素的时代风貌,强化画面厚重肃穆的氛围感。

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的研发,是我国国防科技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里程碑,“银河精神”薪火相传。这幅《装机——银河-I巨型机》,是我以笔墨为科研前辈立像、为“银河精神”存史的一次艺术实践。未来,我仍将持续挖掘我国国防科技发展史中闪光的人与事,以丹青笔墨展现拳拳爱国心。



品画 娄山关北望桐梓(油画,遵义美术馆藏)

范迪安作

娄山关为大娄山脉的主峰,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期间,两次攻克娄山关。2019年,画家范迪安专程来到贵州遵义创作写生。他抱着对革命老区的向往和敬仰来到娄山关顶,在长征第二次娄山关战斗的历史现场实地写生完成了这幅作品。该作以开阔的横向构图铺展画面,远山连绵,气势雄浑;近处松柏苍劲挺拔,与右下角的烽火台遥相呼应。整幅作品让人感受到毛泽东同志《忆秦娥·娄山关》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壮美意境。

(晓芳辑)

从“寻找英雄”到寻根历史

——评徐贵祥中篇小说《归来》

■陈健

征意义的物象。它既是蔡鼎身世的重要物证,也是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纽带。这把宝剑的传奇经历——祖上在贵州做官时于“南岭平叛”中缴获,后被蔡家藏于井壁,大炼钢铁时被蜡封保存,最终等待被挖掘——构成了一部微观的现代史。物的迁徙,暗喻着家族的沉浮;物的沉默,承载着记忆的重量。作者对物的处理显示出高超的叙事技艺。小说的深度在于,它让我们看到:英雄的“归来”,从来不是简单的身份确认,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一次对历史真相的艰难追索。

《归来》的叙事动力源于一个明确的行动:寻找蔡鼎的家人。这条看似清晰的线索,却始终笼罩在“保密性”与“不确定性”的双重阴影下。小说开篇便点明“这项工作其实早就开始了”,这种延迟的叙事时间,暗示了历史真相被遮蔽的漫长岁月。徐贵祥巧妙地设置了多重叙事视角:调查组、地方志办、家族后人、老战士后代——每一种视角都携带不同的记忆碎片,也承载不同的情感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寻找”的对象始终是游移的。调查组要找的是“蔡鼎”,而家族记忆里只有“蔡长沙”或那个“败家子”父亲。这种差异,恰恰构成了叙事张力:一个人如何在历史叙事中获得两个名字?又如何在家族记忆中背负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家族记忆斥为“错误”,而是让两种叙事在碰撞中逐渐融合。当蔡德林坚持认为父亲是个“因为赌博欠债才逃离家乡”的“败家子”时,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愚昧,而是战争年代党的地下工作“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纪律带来的伦理代价——英雄的家人,往往要承受更深的误解与更长的等待。

小说中,“飞龙宝剑”是一个极具象

即送长沙赴沪”的便笺,作为关键证据,也引发了关于“真实”的拷问。调查组组长提出的质疑:“我们怎样才能证明这张便笺是真的,而不是有人别有用心地造假?”显示出作者对历史考证伦理的自觉。他不是天真地相信历史可以“完整还原”,而是让我们看到:历史真相的确认,需要专业、审慎与责任。陈程那句“我拿我的党性保证”,既是特定语境下的政治承诺,也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道德姿态。

“归来”这个标题,在小说中被赋予了多重含义。最表层的是蔡鼎身份的归来——一个被遗忘的英雄,终于被历史重新认领。同时,是家族记忆的归来——那个被家人误解为“败家子”的蔡长沙,终于在半个世纪后,以英雄的身份回到家族叙事中。而更深层的,是民族历史正义的归来——那些在战争年代隐姓埋名、牺牲奉献的无名者,他们的牺牲需要被铭记,他们的名字需要被擦亮。小说结尾处,蔡德林在深夜敲响调查组组长的门,这个动作意味深长。他尚未完全接受调查组讲述的“英雄父亲”,但他已经愿意倾听、愿意质疑、愿意“聊聊”。这种开放性的结尾,比一个“大团圆”式的认亲场面更具艺术力量。徐贵祥让我们看到:历史创伤的愈合,不是靠一次调查、一次座谈会就能完成的;归来的路,漫长而曲折,但总要先有人迈出第一步。

《归来》的主角原型为无名英雄蔡威,福建宁德人,是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讯及技侦工作创始人之一。在几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及时又准确地提供了重要情报,作出卓越贡献。长征途中,他与其他同志一起举办培训班,培养了众多无线电通讯和技术侦察人才。1936年9月,年仅29岁的蔡威,英年早逝。徐向前元帅称赞他为“无名英雄”。因其工作的特殊性,几十年来,蔡威的事迹一直鲜为人知。

在《归来》中,作者的目的不止于为

一个人立传。小说中,蔡鼎只是一个支点,撬动的是覆盖英雄历史真相的整个“冰山”。通过蔡鼎,我们看到了黄佰仟、林向南、胡丛林等一群“舍身赴义的革命者”;通过一把飞龙宝剑,我们触摸了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正如这部小说的责编所言:“英雄从不是孤立的符号,而是无数平凡勇者的集合。”徐贵祥的《归来》,试图在历史的废墟中捡拾被遗忘的名字,让沉默者发声,让失踪者归队。在这个意义上,《归来》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座由文字构成的纪念碑。它不是冰冷的石材,而是有温度的叙述;它不是静态的铭刻,而是动态的寻找。

徐贵祥以其沉稳厚重的叙事风格,完成了这次寻找。《归来》让我们相信: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为那些在历史中“模糊了身影”的人,重新勾勒轮廓;为那些在时代喧嚣中被遮蔽的声音,重新调音。当蔡鼎终于“归来”,归来的不仅是一个人名,更是一种对历史正义的信仰,一种对无名牺牲的致敬。在这部小说中,徐贵祥用文字完成了一次庄严的仪式:让英烈归乡。这,或许就是《归来》最深层的温度与力量。



第6723期

新作评介

英雄叙事始终是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命题。徐贵祥的新作《归来》(刊于《人民文学》2026年第3期),以寻找革命烈士蔡鼎(原名蔡长沙)身世为主线,在历史迷雾与时代变迁的交织中,完成了一次关于记忆、身份与归乡的深沉叩问。这不仅是一个“寻找英雄”的故事,也是一部关于历史如何被尘封、又如何被重新打捞的文学书写。小说的深度在于,它让我们看到:英雄的“归来”,从来不是简单的身份确认,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一次对历史真相的艰难追索。

《归来》的叙事动力源于一个明确的行动:寻找蔡鼎的家人。这条看似清晰的线索,却始终笼罩在“保密性”与“不确定性”的双重阴影下。小说开篇便点明“这项工作其实早就开始了”,这种延迟的叙事时间,暗示了历史真相被遮蔽的漫长岁月。徐贵祥巧妙地设置了多重叙事视角:调查组、地方志办、家族后人、老战士后代——每一种视角都携带不同的记忆碎片,也承载不同的情感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寻找”的对象始终是游移的。调查组要找的是“蔡鼎”,而家族记忆里只有“蔡长沙”或那个“败家子”父亲。这种差异,恰恰构成了叙事张力:一个人如何在历史叙事中获得两个名字?又如何在家族记忆中背负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家族记忆斥为“错误”,而是让两种叙事在碰撞中逐渐融合。当蔡德林坚持认为父亲是个“因为赌博欠债才逃离家乡”的“败家子”时,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愚昧,而是战争年代党的地下工作“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纪律带来的伦理代价——英雄的家人,往往要承受更深的误解与更长的等待。

小说中,“飞龙宝剑”是一个极具象